

《中国丛报》里看广州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对清代广州的报道

庄新

《中国丛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在广州创刊，1851年底因故停刊，为当时著名的在华英文报刊。

裨治文等在华西方人士通过各种形式记录、报道他们所了解到的广州城，并在《中国丛报》陆续发表。特别是裨治文在该杂志所撰写的两个系列性报道——“广州介绍”与“广州漫步”，对广州城历史地理、风物人情、社会机构等有大量介绍，是观察西方视角下19世纪广州风貌的珍贵资料。

广州历史地理情况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8年间，广州以其“一口通商”的重要地位，成为清代中国接触外来世界的唯一窗口。在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报道中，广州也成为观察中国的重要城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作为19世纪最早的一批来华“看客”之一，其对广州的历史地理情况的表述较有代表性意义。

裨治文在1833年8月《中国丛报》开辟“广州介绍”专栏，第一篇从广州城的名称谈起，强调当地人将广州称为“省城”。在随后展开的地理区位描述中，裨治文将目光集中在珠江沿岸：“这座城市建在珠江的北岸，它位于距海大约60英里的内陆地区。商人们会从虎门（当地人将之视为珠江入海口以及内河起点）取道西北方向，便是达到首要港口——黄埔的最佳航线。”裨治文敏锐地聚焦“虎门”“黄埔”两个重要的港口地。可见，在其认知中，要认识广州城的地理区位，首先要认识到广东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裨治文在该文中还报道了广州的历史背景，介绍了这座具有超过4000年历史的城市。他先是概述了广州城市名称的演变，而后便介绍了该地自商代、周代、秦代、汉代、唐代、五代十国时期、宋代、元代到明清时期的历史变迁。裨治文对明清时期之前的广州历史都介绍得较为客观，但在介绍明清时期的历史时，却极为简略，而是用较大的篇幅报道了清代统治者与“反清复明”势力在广州城的斗争。

在讨论广州城的文化意义时，裨治文以全球文明进程的视角，比较了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我们却非常难以准确地发现中国的城市属于怎样的类型、具有怎样的力量。中国的城市确实也很伟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广州是否对整个中华帝国产生了巨大而有益的影响，还是需要我们对其中不同的机构、物产、面积、居民性格等方面作出具体调查之后，才能回答的。”裨治文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对中华文明表示了敬意，强调需要在科学调研基础上对广州的历史文化影响作

清末时期的广州街景



出评价。

广州的街道与风俗人情

《中国丛报》记载了大量裨治文在广州街道的见闻，特别是对弃婴、无业游民及赌博现象有重点描述。

“广州漫步”系列文章记录的是广州的市井场景。1835年5月，裨治文发表该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叙述开垦地、小河、海关、码头、拔火罐店、尼姑、“猪巷”（即新豆栏街）、卫兵室、旧中国街（即靖远街）、算命先生、新中国街（即同文街）。裨治文在1835年6月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在广州富人住宅区及其附近街道散步时的见闻。他在1846年6月发表的该系列第九篇文章，曾对其所见到的停尸房、伊斯兰教清真寺、城北风景、炮台、古堡、与众不同的墓地等城市风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广州城街道上的苦力，作为一种社会阶层或者社会势力群体，也给裨治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裨治文的描述中，这样的苦力群体大概有四五十人，经常在早晨甚至直到中午，出现在广州城的街道上、市场里或者城门口角落处。裨治文认为这些闲散的苦力们，可以说是他在在中国见到的最健康、健壮的男人，但却无所事事、在闲聊中消耗时光。裨治文认为，苦力闲散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在谈及广州城百姓的“斗蟋蟀”活动时，裨治文将其与欧洲民众的兴趣爱好加以比较，从侧面表达了对清代社会民众精神的愚昧性、半开化性

的批判，裨治文称：“‘中央帝国’的子民们从未到过马德里的公牛斗兽场或其他任何西方世界，他们对于精彩绝伦的欧洲斗牛没有任何概念。如果中国民众胆敢切断公牛的头部，或者将这些动物中的一只捆绑起来并将其撕成碎片，他们会立即被清政府的禁令所处置，并会被佛教和尚送到地獄，被那里的怪兽撕碎。”同时，裨治文将风靡广州城的“斗蟋蟀”游戏评论为“这种方式的运动符合这样一个没有平等尊严的国家之体面”。

裨治文在对广州的这些叙述中充满了对清代世相的批判：民众缺乏公共观念，大量无业游民、地方强人和乞丐给社会秩序带来极大隐患，民众愚昧且沉迷于赌博，但其中也不乏值得我们镜鉴的洞悉。

广州的社会机构与场所

《中国丛报》当时还对广州城内的慈善救济机构、教育机构、佛教寺庙等展开了详细报道。这些报道的观察比较细致生动，而且通过对这些机构的介绍来分析清代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如裨治文在1833年10月于该刊发表的“广州介绍”第三篇文章中，即对广州的慈善救济机构（育婴堂、养德院、麻风院）、广州教育状况（书院、科举考试、识字率）及佛教场所（光孝寺、海幢寺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裨治文报道了广州城的育婴堂、养德院、麻风院等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财政来源是裨治文的关注焦点，其背后考量的其实是广州城市治理的程度问题。根据裨治文的统计，在形式上，上

述三所广州慈善机构都是接受政府资助的。而养德院和育婴堂的赞助款项，部分或全部来自那些将大米带到广州的外国船主所缴纳的税款。但在报道的最后，他的结论似乎并不太乐观：“名义上所有拨款都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其实每次拨款数额都少得可怜。”这种结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广州慈善机构运转不佳的状况。

裨治文对广州教育机构的报道着力较多。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官体制是支撑政府稳定的支柱。她的军队则完全不足以将众多且广泛的省份、地区统一起来，而正是这些省份和地区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范围”。在对广州教育机构的调研中，裨治文对广州地区私学、公学范围内的众多书院、清政府科举制度等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其中不乏自省式的论断，并且提到广州的教育机构多以科举入仕为目标。裨治文的表述虽有提及当时广东省城书院繁荣的文化环境，但对广州实际的教育普及程度并未作出较高的评价。

总的来说，《中国丛报》对广州城的报道是基于对广州方志等中文典籍的阅读与实地生活体验、观察等“在地”感受而做出的。虽然《中国丛报》在刊发的20年中始终关注对广州城的报道，但整体性的大篇幅报道更多集中在1840年之前。这一时期的来华西方人除了在地理、历史等方面报道广州知识以外，更对广州街景、慈善机构、文化机构、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报道之中，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社会风俗人情、国家治理问题的认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后，钱锺书忽然接到吴宓女儿吴学昭的来信，整理吴宓日记和遗著的她发现有许多关于钱锺书的记载，于是希望钱锺书能为其父遗作《吴宓日记》作序，并寄来书稿。当钱锺书读完恩师日记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他对于老师的宽容与大度一直铭记于心，立即回信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嬉戏，同学复怙恩之，逞才行小慧……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悔悟。”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算作对老师吴宓的公开道歉。

此时的钱锺书虽以《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管锥编》在学识与声名上已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吴宓，但他在《序》中还是说，“作为一名白头门生，愿列名吴先生弟子行列之中。”

吴宓真诚、大度，钱锺书坦诚、直率。对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吴宓不吝褒扬，一再宽容谦让，足以展现其爱才容人之胸襟；而钱锺书对于年少轻狂的过往，能知耻而后勇，诚挚而谦卑，也彰显大家之风范。正如杨绛所说，“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锺书也是真诚的人。”

文人轶事

在写作形式上，老舍具有多种手段：小说、散文、戏剧而外，还有大鼓词、小演唱等多种民间艺术。他对写作一行，可称深通，他的看法，自然对读者作者皆有启发。

譬如对人物描写，老舍认为，人物描写手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工笔画”式。即“一眼一手都须描上多少多少笔，细中加细。一笔不苟。”他觉得，这有些死下功夫，并明确表示：我不喜欢此法。为何？“因一眼一手并不足代表全人……且欲求人物之生动，不全在相貌的特殊，而多赖性格与行动的揭露与显示。”

第二种手法，老舍这样介绍：“偏重心理的描写，把人的内心活动，肆意揭发。人之独白，人之幻想，人之呓语，无不细细写出，以洞见其肺腑。”这种手法，老舍有看法：“过于偏重，往往因入骨三分，致陷于纤弱细巧——只有神经，而无骨髓。”这种写法，老舍判断：以剖析为手段，视琐屑为重大，自

文人轶事

金岳霖是现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等。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执教时，主讲逻辑学，尽管他讲得非常有趣、津津有味，但还是有些学生觉得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于是好奇地问他：“金教授，您为什么研究逻辑学？”金岳霖笑着回答道：“我觉得它好玩。”从此以后，这些学生认为金岳霖是个有趣的人。他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的好玩是出了名的，孩子们都愿意和他玩。

金岳霖喜欢搜集大号水果，如大苹果、大梨、大石榴等。这些搜集来的大水果，他统统摆在案头，像一排威武的士兵。有客来访，这些大水果就成了他和客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并得意地说：“作为一个人，就要有好好玩的兴致，否则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很多时候，他带上这些大水果和

文人轶事

1913年夏，刘半农将回乡避暑期间的见闻，写成了一篇侦探小说《匕首》，投稿给由“新鸳鸯蝴蝶派”主笔的《中华小说界》，并获得良好反响。此后，刘半农走入了“新鸳鸯蝴蝶派”的阵营，便又以笔名“半依”陆续投稿翻译小说《黑行囊》《顽童日记》《洋迷小影》等，仅1914年他就在该刊物刊登了9篇翻译作品。之后，他又在1914年底和1915年，给“新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个重要刊物《礼拜六》以及《小说月报》《时事新报》《小说海》等刊物投稿，成为当时的小说新秀，“半依”声名鹊起。

1916年10月，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刘半农将他的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灵霞笔记·爱尔兰爱国诗人》发给了《新青年》编辑部，文章在《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获得不错的反响，这也振奋了刘半农拟写革命题材文章的热情。与陈独秀的结识，与新青年的邂逅，打开了他心灵的窗户，刘半农也成了《新青年》文化阵营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大将，以致以后每期《新青年》发刊，陈独秀必约刘半农写稿。

1917年元旦，胡适在《新青年》

文人轶事

晚年的吴贻芳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爱党爱国爱人民》。中华民族有着深厚而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吴贻芳先生是位坚定的爱国者，她一生经历的许多事情，让她明白一个道理：只有爱国，只有努力奋斗让国家强大，中国人才能在世界上挺起脊梁。

吴贻芳给学生讲过这样一件事，她当年在美国，有一天，她乘火车经过国境边的一个小城市时，已是深夜，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后，进来几个人，查问她：“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是日本人，即可乘车通过。如果是中国人，必须下车。”吴贻芳一听，强忍住心头怒火，大声地回答：“我是中国人！”这样，在漆黑的夜晚，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她正气凛然地高昂着头从火车上走下来。最后通过中国驻外使馆的帮助，她才到达目的地。

老舍说人物描写

杨建民

难健康。“可以博得少数人的欣赏，殊难给人生以重大的训教与指导。”

那么第三种呢？老舍用了一个他人少用的词：“我管它叫作戏剧的描写法。”他是戏剧写作高手，他这样概括：写戏剧的人应当把剧中人物预先想好。其中包括：人物的世家、性格、职业、习惯等等，达到“一闭目便能全人立于眼前”。这时，人物遇见不论何种事件，可能产生何种反应，作者了然，描写自然真切。作品中人物对话，“无一语不恰好的配备着内心的与身体上的动作”。老舍自己认为：“最好是采取戏剧的写法，这样可以“以最精到简洁的手段，写出人物的形貌，以呈露其性格与心态。”老舍的小说，基本运用这样的人物描写手段。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康健的、正确的，写出人与事之联结，外貌与内心的一致或相反”。这虽然是老舍的一家之言。可由于他的文学成就，这又是人们可以借鉴的重要阅读及写作参考之法。

金岳霖的“好玩”

张雨

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看谁的水果大，比输了，他就把水果送给小朋友，而后再去买。买回后，继续和小朋友们去比赛，常常乐此不疲。

除了与小孩子们比水果外，金岳霖还喜欢养公鸡。他养了一只大红公鸡，这只公鸡能把脖子伸上饭桌，和他共食共饮，和平相处，其乐融融，他很享受这一独特的景象。每天下午下课时分，他便带着这只大公鸡外出溜达，这简直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引来路人纷纷围观，此情此景，令他十分惬意。不少人曾对他的癖好很是不解，试图从他那里得到答案，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觉得它好玩，除此之外，别无他图。”对此，哲学大师冯友兰这样说：“龙荪（金岳霖的字）的风度，与魏晋大玄学家嵇康有一拼。”

金岳霖的好玩，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玩”。其实，这是金先生的一种生存方式，他看淡名利，与世无争，放松心情，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刘半农改名

崔鹤同

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文章中他主张“破除旧的文学规范，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面貌”，引起了极大反响，得到很多活跃在文坛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支持和赞同，也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改良”的论争热潮，新文化运动也由此拉开了帷幕。为了推波助澜新文化运动，积极响应胡适、陈独秀等文学改良派们的号召，1917年5月1日，刘半农发表了关于文学改良的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正式踏入了文学改良的阵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虽然他的观点未获得全部的认可，但他关于对标点符号的看法，关于诗歌他提出“改用新韵”“增多诗体”及“提高戏曲的地位”等观点，胡适非常赞同。他的举动深深地鼓舞和影响了许多人，壮大了文学改良运动的声势，也是他从“新鸳鸯蝴蝶派”转变为一名文学运动革新者的标志之一，刘半农也终于认清自己将要行走的道路——追寻新文学。

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时，抛弃了以往为了迎合大众读者、媚俗香港的笔名“半依”，正式署名“半农”。鲁迅说刘半农自此跳出了“新鸳鸯蝴蝶派”的旋涡。这个名字也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吴贻芳的爱国心

周二中

当然，还有更为惨痛的事在后面。吴贻芳回忆说：“最难忘的是1937年12月2日那一天，金陵女大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被迫迁到成都。船从南京下关出发。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没有自己的轮船，可乘坐的却是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一响，轮船从码头驶靠江心一艘英国军舰作‘保护’，警报解除，船又重新回到码头。那天空袭七次，轮船就这么从码头到军舰来回七次。江岸上无数难民携老扶幼，被国民党政府遣弃，任凭日本飞机的轰炸。面对着祖国遭蹂躏，同胞被屠杀的情景，我真是心痛欲碎啊！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使我萌发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我觉得，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就得任人宰割，我们要爱国！”“我们要爱祖国！”这是吴贻芳的泣血呐喊，更是她一辈子呕心沥血所践行的目标。